



肖应勇正在与在押人员交谈。



更多精彩内容，  
请扫描二维码。

美国著名心理学教授埃克哈特·赫斯曾做过一项实验,他随机给男女参与者看一些照片,然后观察他们瞳孔的变化。实验的结果表明:人类瞳孔的大小不仅会随周围环境的明暗发生变化,还受到对目标关心和感兴趣程度的影响。例如,当女性看到怀抱孩子的母亲的照片时,瞳孔平均扩大了 25%。

“眼睛比嘴巴会说话。”就像人们经常说的,人的心理活动会显露在眼睛中。如果仔细观察瞳孔的变化,可以得知对方的心理状态。如果对方看上去心不在焉,可他眼珠深处的瞳孔却在渐渐扩大,由此可以断定,他满不在乎的神情下,掩饰的是对该话题的强烈关注。

在看守所这个限制人身自由的特殊空间里,至少有三个人群的瞳孔一直在扩大,它们是——社会的“瞳孔”、看守警察的瞳孔和在押人员的瞳孔。

### 盯住在押人员的一举一动

“‘咣当’一声拉开监室大铁门上面的小铁窗,警觉的瞳孔放大,眼光如同探照灯的光柱,把监室的每一个角落扫射一遍……”

当民警杨健宁听到这样的描述时,不禁笑了。“你说的是几十年前的看守所了。现在,我们有专门的民警,在监控室监视每一个监室的画面。哪怕是一个微小的手指动作或者面部表情都逃不过。”

从高速公路交警到看守所民警,杨健宁一直在“用眼睛工作”。只是以前关注的是高速公路上的交通安全,现在盯住的是监控屏幕上在押人员的一举一动。“他们有任何异常举动,负责监控的民警都要立即报告,管教民警就要及时进行干预或者处置。”

田荣峰是云南省看守所的“头儿”。由于人事调整,省看守所目前尚未配备所长,他被指定以政委身份全面主持看守所工作。

“最近 5 年,中央加大反腐力度,职务犯罪是其中的一个打击重点,有不少曾经的官员在这里进出。”田荣峰说,因此,在这里工作的警察,他们在精神、情感、耐心和时间等方面的投入,远不是一般警种可以比拟的。但若按照常规的统计或考核,他们又说不上有什么可歌可泣的成绩。

今年 2 月,田荣峰向云南省总工会推荐三队队长沈志宏为劳动模范。在陈述沈志宏的工作业绩时,他却犯了难。整个看守所这几年都是风平浪静的,沈志宏为这种平安祥和做出了很大的贡献。但又很难找到支撑他成为先进人物所需要的数据,比如抓了多少人,救了多少人,平息了多少起事故之类。“我们这儿就没发生过这些事,在看守所,不出成绩才是最大的功绩。”

沈志宏的材料报送到云南省总工会,分管劳模推荐工作的副主席潘红伟也纳闷了,几页 A4 纸里,连阿拉伯数字都不多,仅有的几个还是年月日之类的“无效数据”,反复盯着看这几页 A4 纸,潘红伟看不出沈志宏“轰轰烈烈”的业绩何在。

了解看守所性质的工作人员给他作了解读:“看守所类似贵重物品保管处,把人好好地接进来,到办案单位需要的时候,把人好好地交出去。所以,他们永远不可能有惊人的业绩——因为这些业绩本来就毫不惊人。”

不仅不惊人,有时候还难以理解。沈志宏曾经在医院看护过外出就医的在押人员。这人因刚刚手术,大小便不能自理,沈志宏就为他提供方便。“你一个警察不去捉贼,反而在这里为‘人犯’端屎端尿?”同室的其他社会病人,惊讶到瞳孔放大,眼中充满了疑惑。但在沈志宏眼里,在这个时间段,这个场所,“端屎端尿”就是他履职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。

潘红伟听懂了,笑着领首,“下次请他们早一点报材料”。由于报送时间迟了一步,沈志宏与这次的劳动模范(先进工作者)评选擦肩而过。

### 笃定光芒背后,是法律的要求

赵云红是云南省看守所的副所长,2016 年 8 月才调入看守所工作。

此前,他在云南省公安厅督察总队,尽管督察过全省 100 多个看守所,但关注的都是易出问题的环节,对看守所并没有细致深入的了解。

刚到省看守所,第一次去监室检查,赵云红睁大了眼睛:他发现这里居然有几个煮熟的鸡蛋。他以为自己有了重大的“问题发现”,没想到田荣峰咧嘴就笑,眼睛里尽是轻松和坦然,“间间都有,是所里给在押人员正常的生活保障,就是给他们吃的。”

这是为了看守所的“平安、平静、平常”。“来之前我没有白发,这 9 个月,你看看,长了 30 多根。工作强度不大,但是很累。”赵云红说,在这里,你随时时刻睁大眼睛,不能有一丝马虎。

心累的不止是看守民警,还有一个女检察官干部。她叫杨敏,云南省检察院驻省看守所检察室主任。

在 1997 年之前,杨敏也是警察,但现在,她是作为看守民警以及办案单位的监督者出现的,“我负责监督执法”。

“曾经有个人被送进来,办案单位要求单独关押。我和省看守所领导研究后认为这个要求于法、于规、于



司亚夫曾逐页“审看”医学书。

## 公民特稿

### 特稿 79

# “说话”的瞳孔

本报记者 陈昌云 黄榆

如果仔细观察瞳孔的变化,可以得知对方的心理状态。

在看守所这个限制人身自由的特殊空间里,前市长、前公安局长、涉嫌犯罪的企业老总、受贿

100 套房子的医院院长、“10.5 湄公河惨案”的主犯都曾在法律的监视之下。

社会公众、看守警察和在押人员,他们的瞳孔一直在扩大。



民警杨健宁(左一)押解“10·5 湄公河惨案”主犯糯康(左二)。

况发生了几次,他就不高兴了。

面对 930 的愤怒,肖应勇微笑着,双目平和地看着对方:“你当过领导,应该比我懂。调整监室在看守所是大事,所领导决定了,我作为下级,只有服从的份儿。”930 听完,情绪稍缓,若有所思,也不再说话了。

930 在判决生效后,和肖应勇还发生了一次语言交锋。当时,930 的姐马来看守所申请会见他,申请书写好了,但当时看守所领导在外开会,找不到领导签批意见,电话也联系不上。肖英勇对他姐姐说:“只有改天了。”

930 通过律师得知此事后,质问肖应勇:“家属会见为什么这么麻烦?所领导到哪去,你怎么不知道?”

肖应勇依旧带着一张可以令情绪暴躁的人立马缓解的笑脸:“家属申请会见,作为工作程序,没有领导签批意见同意,我不可能让你们会见。所领导到哪去,人家不可能向我肖应勇报告。你以前上哪儿开会或者办事,会向你的下属一报告吗?”

一席话,让情绪激动的 930 立即安静了下来。

多年的看守警察工作经验告诉肖应勇,对于像 930 这样的前官员,应该柔中有刚,“也就是看起来很温和、很客气,很有礼貌,但工作原则决不能动摇”。

他还摸索出了不少的工作经验,比如他从直呼被羁押人的姓名,就叫老李老张;和被羁押人谈完话,将其送回监室时,他总会轻拍他们的背,说一句“安心心地待着,有的事,你着急也没用”。

### 逐页“审看”医学书

社会上一度传闻甚广的云南某大医院“双百院长”W 也关押在这里。

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新闻通报称,此人受贿 100 套房子,100 个车位,所以叫“双百”;而他是医院院长,故名“双百院长”。

此人被调查后,关于他的传闻声浪汹涌澎湃,因此,从事过 10 年监管工作的警察司亚夫对他印象很深。

W 刚进来的时候,因为担心会被判得很重,思想压力极大,整天双眉紧蹙。“你要配合办案方,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,任何国家都有行为规则,不是丛林社会。”司亚夫一边安慰他,一边给他讲述看守所的规矩。

入所一段时间后,W 想看业务书。看书学习也是看守所管理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,但司亚夫犯愁了。因为 W 点名要看的书是《实用内科学》,但所内的图书室没有。经所领导同意,司亚夫出去买,“跑了两个书城没找着,最后是在网上买到了,花了 200 多元钱”。

书买回来以后,司亚夫没有直接给他。由于工作对象的特殊性,加上信息无法完全对称,他把书放在宿舍里好长时间,“主要是考虑这套书给他看合不合适,他会不会要打什么歪主意。”其实,司亚夫是担心书中有教授自杀的方式,“比如用什么药物啊之类的”。

司亚夫只好自己先硬着头皮用“硬啃”的方式,逐页“审看”这套厚重而专业的医学书。看完后,凭自己的理解,感到没有传授自杀等危险内容,司亚夫才把书给了 W。

听司亚夫说在没有任何医学知识的情况下,读完了该书,W 的瞳孔释放出柔和的光线,一种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油然而生。

这件事,也让司亚夫感到,对一个犯罪嫌疑人的管教,不能只是停留在表面工作,而要深入其内心,引起他的共鸣,他才能心甘情愿地接受你,也利于心平气和地反思自己。

司亚夫认为,看守所管教民警除了确保被羁押人员的安全外,还有一个重要任务,那就是将这些破坏社会游戏规则的人,“通过回炉,唤醒他们重新遵守规则

可以直接找到我。我告诉他 24 小时有民警看护他,让他尽管放心休息。”

糯康曾经“呼啸山林”。没有规律的生活和作息,让他患上了高血压和胃病。看守所医生每天两次给他做检查,遇到提讯,在讯前、讯中、讯后都要给他测量血压。

刚进看守所,由于饮食习惯,糯康吃得很少。看守所领导发现问题后,及时根据他的饮食习惯调整了饭菜。

糯康不识中文,但可以讲简单的中文词汇,杨健宁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,用图书与他沟通。

“我找了 300 多本画册,涉及风景、汽车、餐饮、服装等等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,我们交谈时,指着图画,再用手势交流。第一个月,对他的审讯比较频繁,每次办案机关对他提讯完回到监室,哪怕两三分钟,我都要和他交流,疏导他的情绪。就是看到他由于语言不通无法交流,但又必须舒缓他低落的情绪,我才想到用画册‘看图说话’的。”

约 3 个月后,糯康渐渐熟悉了环境,熟悉了杨健宁。有了基本的信任,他甚至主动和杨健宁搭讪聊天,“他指着画册上的日产普拉多汽车和别墅,对我说两个中文单词——‘我,有’”。

### 临刑前,糯康要把照片交给他的

“他常常是笑容可掬,每次提讯他,戴着手铐的两只手总是要双手合十,行礼如仪。”令杨健宁惊讶的是,糯康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。他每天都要礼佛,很讲卫生,衣服洗过后要让太阳暴晒,要求定期理发刮胡须。

糯康犯下的罪行与现在的“温文尔雅”,简直是天壤之别。“这是人性的两面,是对现在羁押生活的顺从和接受”。

但杨健宁不敢懈怠,“虽然客观上糯康一次麻烦也没找过我们,但我心理压力大,毕竟你不知道他到底想什么”。

在看守所待了半年后,案情逐渐明朗。通过律师,糯康收到了一张“全家福”照片,“糯康有两个老婆,12 个孩子。他拿着照片,指着小的孩子说‘3(岁)’,指着大孩子说‘大,学’。我跷起大拇指对他说,‘儿子顶呱呱,女儿漂亮’。”

这张照片,从此成为糯康在看守所里唯一的、可接触的、最重要的物质性财产,“他平常放在枕头上,或者揣在衣服口袋里,经常拿出来看”。

除了糯康,杨健宁还管着同案“4 号”嫌犯扎西卡。杨健宁比较过扎西卡与糯康的不同:“扎西卡个头矮小,形象较差,糯康则相反,气质很好、个头中等,在男人堆里,长相属于俊朗那种。”

2012 年 11 月 6 日下午两点,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糯康等 4 人死刑。

糯康被押回看守所,杨健宁照例找他谈话,发现他情绪明显低落。

“你是否知道结果?”杨建宁问他。

他说:“死,刑。”

“知道什么是死刑吗?”

“知,道。”

“你有什么想法?”

“没,有。”糯康再无其它的话语。

一审宣判死刑后,按规定要给他上脚镣,糯康的脸色骤变。杨建宁对他说了“规定”两个字后,他点点头。杨健宁安慰他,“不,怕。”他还是不说话,只是点点头。杨健宁指指天,说:“你可以上诉。”

双脚加了镣铐,担心镣铐磨脚,杨健宁等人找来筒袜,把镣铐包包住。糯康看出杨健宁他们对他的关心,就一一作揖致谢。

从一审判决宣布到终审判决后最高法院下达执行死刑命令,其间有两个多月。杨健宁发现,这段时间,糯康明显寡言少语了,“以前他还会和我们开玩笑”。

糯康的生命进入倒计时阶段。杨健宁等民警的压力更大。他们专门找了不少泰国民俗风光人情方面的书籍来看,掌握泰国的节日,遇到节日,给他做过节的准备。

“糯康来时,基本没衣服。他在所里这 9 个月时间,所穿的衣服全部是我们给他添置的,季节入秋冬变换时,还要及时给他添置厚衣服。”杨健宁说。

2013 年 3 月 1 日上午,糯康早餐吃米线,午餐杨健宁给他端来了米饭、鸡蛋炒番茄、炒肉、水果,他吃了四个口就不吃了,“平常他从不剩饭,总是吃得干干净净”。

在绑缚刑场之前,他从身上掏出了他唯一的财产——那张“全家福”照片,递给杨健宁,意思或者是要赠送杨健宁,或者是请他代为保管。杨健宁通过翻译告诉糯康:“我拿你的照片不合适,还是你自己带着。”

“他点点头,又把照片揣在衣服里。”杨健宁语速放缓,陷入回忆中,“本来照片是搁在枕头下的,那几天,他天天揣在身上”。

糯康之所以有如此动作,现在已经不能求证,但有一点是肯定的——经过 9 个月的朝夕相处,或许糯康觉得唯一可信赖的人就是杨健宁了,即将赴死之际,他才把他最珍贵的唯一财产交给杨健宁,但双方关系太特殊,杨健宁在当时的确没有更好的方法或恰当的理由接受他的照片。

中午 12 时,在媒体实况直播中,糯康和另外被判处死刑的罪犯桑康·乍萨、依莱、扎西卡,被呼啸的警车载出看守所。约两小时后,4 个人被法律结束了生命。

273 天高强度的工作状态就此解除,杨健宁终于可以用散淡的心情,好好打量昆明阳春三月的明丽天空。“天空有几朵云,像白絮一样,轻盈地飘。”

他想家了。

本版照片均为受访者提供



工作中的沈志宏(左二)。